

“抗日战争时期的 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长林 章 林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推进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开展,2015年1月9日至11日,由《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山西、吉林、湖北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60位学者与会。会议进行了八场专题讨论,与会学者围绕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研讨。

一、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社会动员

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取得最后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结果;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甲午战争以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何晓明(湖北大学,《中日战争与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宏观上考察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革命党人以及后来的国共两党进行变法、革命,直至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程。他指出,从大的方面看,各派政治力量、政党及社会团体在国难危局面前,将抗御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振兴中华作为共同的政治任务。

然而,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混战,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政策,抗日救国力量的统一障碍重重。同时,国民的动员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有必要探讨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环节及具体路径。由于日军残杀中国人的暴行激起了国人的极端愤慨,抗日救亡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抗议性的极端行为,就这些

行为对于激发国人抗日的的作用,刘长林、彭小松(上海大学,《国难中的死谏: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极端抗议行为及其社会价值》)从媒体关于自杀、绝食等极端抗议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出发,考察九一八事变前后学生、青年、军人、职工、官员、老妪老翁等自杀抗议行为,论述民众的个体绝食及群体性的“绝食接力”抗议及其社会意义,以及媒体如何及时报道及运用自杀符号抨击时弊,促成抗议诉求的传播。作者认为,这些极端抗议行为既承继了中华民族传统“死谏”的忠义文化,也符合现代社会集体性政治抗争的特点,展示了力促政府积极抗日、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热情的社会价值。社会舆论在对这些极端抗议行为给予理解与同情的同时,也指出这不是正当的救国方式。

用什么样的话语进行抗日救国动员?这些话语又怎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常用语?杨雄威(上海大学,《抗战三十年:民国时期的“亡国奴”想象与反日动员》)从观念史和传播史的角度,考证了近代中国知识界与政界精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不断建构“亡国奴”这一概念,并促使这一概念在舆论中发挥独特动员作用的过程。他指出,从一个概念演变成一种标签,“亡国奴”话语在发挥民族动员和社会文化改造作用的同时,也兼具软暴力的特征,是近代中国的“称谓暴力”之一,也是现代性在中国的一个重要表征。

国货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对于国货宣传如何被普通市民所接受,潘婷(上海大学,《多元价值追求下的上海国货年运动:以〈国货周刊〉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1933—1937年上海国货年运动中市民消费国货的爱国情感与实用主义消费观的冲突。她认为,国货运动虽得到人们支持,但在追求多

元价值的上海人面前,这种爱国情绪宣泄的方式与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发生着强烈碰撞,喊口号与消费行为并不完全统一。在大都市的商业氛围熏陶下,上海市民在进行消费选择时,日常生活经验中累积起来的世俗价值追求起着重要作用,市民对国货品质的要求促使国货企业不断改革,上海城市鲜明的性格特征成为国货年运动在上海发展的助推剂。

二、抗战时期的社会病态与下层生活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苦难,也使毒品、乞丐、自杀等社会病态问题更加突出。战争还产生了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战俘这一特殊群体。

对于上海毒品的泛滥,蒋杰(华东师范大学,《战时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以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到抗战结束之际的上海毒品贸易与消费为考察对象,围绕日军控制下的垄断性毒品贸易、民间的“非法”毒品走私、战时毒品贸易与消费空间的变迁、战时毒品犯罪的司法惩处等问题,详细勾勒了“战争初期”、“宏济善堂时期”和“陈公博时期”三个阶段上海毒品贸易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作者认为,战时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事实上存在于华界(合法)和租界(非法)两个不同空间之中,具备“合法”(由宏济善堂经营的毒品)和“非法”(走私毒品)两种不同属性。日本人觊觎毒品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采取各种“宽容”措施,极大地刺激了毒品的贸易与消费,上海由此进入一个自晚清禁毒以来少有的毒品“黄金时代”。同时,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等合成毒品取代了鸦片,上海形成已久的毒品消费习惯至此发生重大改变。毒品贸易与消费展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形态,是日军占领上海后城市权力结构、经济趋势、市政管理以及社会生活变化带来巨大影响的结果。

乞丐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标签性的病态社会问题。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乞丐问题》)探讨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上海乞丐增多的原因,叙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状况以及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救助和慈善行为。作者指出,当时上海乞丐问题具有数量呈阶段性激增、死亡率高、染毒、出现拦截强索路人和抢劫盗窃等突出特征,这是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上海慈善热心人士、各领袖善团及中外人士组织的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救世军等均对乞丐进行过救助。日伪上海市社会局成立乞丐收容所,宣称解决乞丐问题。但是,光靠几个乞丐收容所收

容处置难民,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救助也掩盖不了日本侵略者是悲剧制造者这一铁的事实。

自杀也是病态社会的一种,章林(上海大学,《抗战时期上海社会生存状态——以自杀事件为中心的讨论》)归纳当时自杀现象的成因:有经历颠沛流离的避难逃难而后自杀的,也有难以承受战时恶劣经济环境与高昂物价,因生活紧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有无法应对失业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对社会失望而自杀的,也有遭受日军布置的烟、赌陷阱侵害而自杀的,这都是因战争而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的反映。与抗战爆发之前常态社会中的自杀事件相比较,战时发生的自杀行为多与日军侵略战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带有战争时代的特殊性。

战争时代的特殊群体战俘的生存状态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张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军集中营里的中国战俘》)讨论了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在中国各地设置的战俘集中营中的中国战俘的生存状况、日军对战俘的政策等问题。作者指出,由于日本一直不承认其对中国的侵略为战争,一直将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等同于“土匪”,因此不承认中国战俘的政治身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针对中国战俘的管理政策。日军设置战俘营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中国战俘的“思想改造”,消弭战俘的抗日情绪,同时掠夺中国战俘的劳动力资源,服务于以战养战的需要。战俘在集中营中的一切活动完全被控制,物质生活极端缺乏,受到饥饿、劳累、疾病以及精神方面的摧残,死亡率较高。

三、国难之下的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

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学校教育如何在逆境中存续和发展,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

蒋超(河西学院,《李应林与抗战时期岭南大学的播迁及经费筹措和治校》)考察了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在李应林校长主持下迁往香港,又辗转粤北,抗战胜利后复归岭南的过程。作者指出,岭南大学的成功搬迁,离不开校长李应林正确的治校方略和对办学经费的努力筹措。抗战时期的岭南大学在延续中国高等教育薪火的同时,为服务抗战大局、促进区域发展作出了贡献。

内迁学校与中央政府及迁入地政府之间存在权力博弈。韩成(华东师范大学,《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大夏大学国立化风波为中心的研究》)认为,抗战时期私立大学国立化问题反映了中央与对方在教育问题上的权力之争。内迁贵阳的私立大夏大

学因经济困难,不断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教育部长陈立夫鉴于贵州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出于合理分配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考虑,以大夏更名为贵州大学作为允许其改为国立的条件。寄望于回迁上海复校的大夏当局不愿接受这个条件,以校董会中的中央要员为后援屡次向教育部抗争,最后以保持私立身份并获得高额补助告终。

张立程(浙江大学,《孤岛时期之江大学的联合办学》)考察了基督教教会大学之江文理学院在抗战时期先后迁往杭州、屯溪,最终在孤岛上海公共租界与流亡的各基督教大学联合办学的历程。抗战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因由英美中立国控制的特殊性,成为华东地区许多基督教大学躲避战火和日伪控制的首选之地。随着大量华界难民涌入租界,以及不断扩大的战区中的富有阶层携家小纷纷来沪避难,大量新生申请入学,学生人数急剧回升。作为基督教大学联合办学计划的一员,之江尽最大力量弥补战争的影响,想方设法创造办学条件,迅速恢复办学水平,并获得了较程度的提高,培养了大批能够为抗战服务的实用人才,土木工程学科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以国民政府教育部认可其办学水平、同意改办综合性大学为标志,达到了孤岛时期办学的最高水平。

战时,国民党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影响师生的日常生活。岳晟恺、严泉(上海大学,《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考察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中的党化教育的推行方式、执行情况、实际效果等,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虽然被称为中国的“民主堡垒”,但也必须推行党化教育。西南联大有半数教授成为国民党党员,党化教育的课程均由知名学者讲授,在推行初期亦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该校并没有完全贯彻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受到抗战形势变化以及各种政治活动影响,教授、学生生活困难,对国民党的抗战施政越来越不满,西南联大的党化教育最终并没有达到当局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尽管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仍取得了发展,但饱受战乱的广大师生在坚持上课、继续研究的同时,也遭受了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和牺牲,在艰难困苦中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

沦陷区学校师生在险恶的环境中谋求生存。刘雪芹(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抗战时期女子大学的日常生活——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考察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状况及反日军控制的斗争过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学校或关闭或内迁,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却于此时

在孤岛上海创办。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对该校从间接影响到直接占领,关押教师至集中营,强迫教授日语,最终占领校园为伤兵医院。校方则从中立到有限顺从,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与日军展开博弈,争取国籍属于日本盟友国的教师活动自由,告诫师生“尽可能远离政治”,开源节流,争取了生存空间。学校能够存活下来,重要原因在于学校的圣心会宗教背景,使之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与法租界公董局及日军的关系。

许多知识人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并对时局有所贡献。翁有为(《史学月刊》杂志社,《抗战时期的钱穆与吴宓的日常生活》)梳理了抗战爆发后钱穆、吴宓在昆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等校的学术活动以及他们的共事和交往。在南迁途中,钱穆与吴宓得以晤面,两人虽然专业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则有了十分相近的经历。由于民族危难,以及受战时民族主义思潮的激励,他们的思想开始转变,致力于阐述传统文化精义,激发中国的民族精神。他们都是坚守儒家传统文化的“弘道者”,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即使受到新文化派学人的激烈批评甚至攻击,也仍然坚持民族本位立场。他们的经历也说明,民族本位文化派当时仍然处于学界的边缘,并没有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

知识人在战时经常面临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战时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与死难——以大学师生为中心的考察》)借鉴疾病社会学理论,考察战时大后方高校师生罹患疾病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等情况,揭示了战时恶劣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于知识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侵害。为了谋取更多生活资源,知识人大多从事兼职,超负荷的工作也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在经历“病痛与死难”生活体验的同时,由于不平等、不公平、不受重视等现状,知识人的心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抗日战争中近敌区域知识人的生存状况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李常宝(山西师范大学,《抗日根据地小学教员群体的生存样态——以太行区襄垣县为中心的考察》)以敌我政权并存的太行区襄垣县根据地的的小学教员生存状况为例,分析了抗日根据地小学教员群体的生存样态。面对日伪势力的冲击和根据地整风的压力,该地小学教员由于难以从容抉择而呈现出依违失据的局促状态,导致他们在执行中共抗日救国新教育方针时消极被动。小学教员中的一部分实现了由文教干部向政工干部的华丽转身,一部分因不愿承受从教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回归了政治属性不强的农业生产,而继续留在讲坛者,在忍受生活清贫和环境压力之

余,也表现出对于权势意志的顺从,以及对这种顺从的困惑。

四、抗战时期的政党建设与社会力量整合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国共两党和一些社会团体均致力于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救国,同时尽力扩展自身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的形式与途径,罗衍军(聊城大学,《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为中心》)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生产动员和乡村社会整合的内在关联,分析了中共生产动员的主要组织方式劳动互助组的开展情况,以及生产动员的重要手段:开会和学习、改造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懒汉二流子、动员妇女、以劳动模范激励民众等。原属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运动,经过一系列仪式性动员和扩散性阐释,在农村得以凝聚向心力,从而实现对乡村民众经济、人身、思想和行为的整合。生产动员不仅成为掌控乡村社会的途径,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的崭新形象,并成为与国民政府逐鹿中原、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王明前(厦门大学,《“三三制”和“两面派”——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出,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建设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的历史特点和地域特色。边区在面临日伪疯狂“扫荡”、中心区暂时沦为游击区时,因地制宜地转换政权建设方式,通过培植“两面派”政权坚持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种特殊的政权形式经过争取和改造,部分可以对敌应付、为我所用。

刘志鹏(山东师范大学,《沦陷区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群体探究——以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为例》)以战时蛰伏于山东沦陷区域和灰色地带的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民党中央为适应形势在沦陷区地方党务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尝试。作者论述了失去军政保护的国民党基层党务干部的生存状态,包括党部委员的任用与流动,基层党部的组织状况、工作效能、内部关系及党员日常生活,展示了国民党因应沦陷局势在地方党务调适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局限。

丰箫(上海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人员流动及战后心理》)主要采用江苏省吴江县1946年“第二期乡镇组民政干事训练入学考试自传试卷”和“第三期乡镇组民政干事训练结业考试卷”档案,分析战区基层职员流动原因及其心理特征。文章以106名乡镇职员为分析

样本,得出以下结论:战时吴江维持地方社会治安的乡镇组干事,近一半来自江浙以外地区;他们的流动方式主要有:参加当地的武装部队、参加地方保卫团、随部队迁移到外省地区、为糊口四处奔波求职、失业在乡保命等等,根本谈不上深刻认知乡镇建设训练的内涵。他们对于自身的前途比较迷茫,甚至担忧自身生存问题。抗战结束后,乡镇职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均处于一种滞后状态。解放战争中,许多乡镇职员原地待命,保管好自己经手的文件、账册、报表等,配合共产党的接收工作,从而实现基层政权相对顺利地过渡。

王瀛培(华东师范大学,《“医学共荣”还是“殖民地医学”:汪伪国民政府治下的医学卫生——以1943—1945年伪〈申报〉为中心的管窥》)以汪伪时期《申报》鼓吹性的报道为视角,揭露了“大东亚共荣圈”政治体系下的汪伪政权“重视医学卫生”的本质。作为傀儡政权的汪伪国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鼓吹通过“互相提携”达到“医学共荣”目的,实际却是旨在维护统治稳定的“殖民地医学”。

五、战乱生活中的慈善与救助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酷的摧残,迫切需要对伤员及灾民进行救助和抚慰,宗教界、社会团体、政府均展开了相应活动。

对于传教士的慈善救助活动,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在主题报告中以法国传教士饶家驹为个案,考察了他于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间在上海创立进行战时平民救护的饶家驹难民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的始末。他认为饶家驹的活动令人敬仰,值得在历史上记上一笔。

洪伟(南京晓庄学院,《抗战时期江南地区穆斯林慈善活动》)对抗战时期南京、上海、镇江、扬州等地回族穆斯林“难民救济、送诊施药、亡人殡葬、维持教育”等慈善活动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这些慈善活动体现了伊斯兰教的行善观念,不仅与回族穆斯林的信仰有关,还受回族富商阶层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穆斯林的慈善活动既是民族自救,也维护了民族宗教习俗,赢得了教内赞誉和社会好评,提高了华东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声誉。

吴华(四川大学,《抗战时期的宗教慈善活动——以成都佛教界为考察对象》)考察了战时四川成都佛教界的慈善活动,包括确立救国不悖佛教观念,动员僧众参加医疗后援工作,成立僧侣救护队;响应政府号召,发起献机运动;关爱监狱囚犯,实践佛教的社会关怀;

开展医疗救济,举办法会和慈善公益活动;为社会提供心灵抚慰等宗教服务。这些活动既为国家抗战建国出力,也为自身争取了生存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慈善活动也由传统的“行善积德”逐渐向“服务社会”过渡。

李强(上海大学,《国家危难和个体生存:抗日战争时期苏州地区“网船教友”》)讨论国家危难下的个体生存问题。他考察了抗战时期苏州、上海地区以渔业和水运为生的“网船教友”的宗教活动、日常生活及其生存处境。作为中国天主教信仰人群中以职业区分的宗教社群,“网船教友”是西方天主教会传统与中国处境相结合的产物,是天主教本地化的典型宗教社群。这一群体的虔诚宗教信仰强化了他们的共同体意识。教友之间的生存帮扶,为“网船教友”度过艰难岁月提供了精神支撑,也支持了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网船教友”是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之一。

战时国家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徐文彬、钟羨芳(福建省委党校、福建师范大学,《抗战时期的国家与民间组织关系变迁——以福州救火会为论述中心》)讨论抗战时期福州地方政府强化对救火会的改造,并对其实施控制的过程。作为社会组织的救火会,原相对独立于官方,具有较大活动空间。抗战爆发后,地方当局以爱国相号召,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行保甲制的同时,力图掌控民间组织,建立党政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福州救火会随即被纳入军政体系,独立性受到约束,逐渐沦为政府附庸,会务难以自决。

中国接受国际援助问题也有学者涉及。刘文辉(广西师范大学,《抗战时期中国对国际援助的回应——以广西桂林为例》)指出,中国在接受国际援助的同时,为盟军提供了高质量的后勤服务,对朝、越等东亚民族的解放事业予以无私的支持,对落难的归侨加以救助。中国对援助的回应,成本是相当大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也有学者论述沦陷区汪伪政权对难民的救助。徐鹏(北京大学,《沦陷时期上海奉贤地区的社会救济——以民国奉贤档案为中心》)梳理了汪伪政权时期奉贤地区的社会救济事业。作者认为,奉贤地区救济事业的两次改组在一定意义上应予认可,这两次改组推动了当地救济资源的整合,促使救济机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但不能因此忽视其改组背后的政治因素,基层社会救济组织的改组终究是汪伪政权“清乡”和巩固底层统治的配套措施。

日本政府对日侨的救济是以往较少论及的问题。

张智慧(上海大学,《战前上海日侨社会的救济问题: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围绕北伐战争后日本政府对上海日侨救济问题的背景、上海日侨的业务恢复贷款、因贷款而浮出水面的民团内部对立等问题,探讨日本政府、驻沪领事馆、民团与上海日侨的相互关系以及日侨社会的内部矛盾。作者认为,日本政府为了实现难民的安定和国权的扩张,对负责救济的强硬派、实力派和民团的救济举措,采取了妥协和默认的态度,最终造成接受日本政府救济的上海日侨与周边中国民众的关系紧张,从而成为导致“一·二八”事变爆发的一个历史原因。

以往研究对在上海的第三国侨民的赔偿问题更鲜有涉及。忻平、张智慧、吕佳航(上海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赔偿问题》)利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近期公开的日本外交档案史料,探讨了“一·二八”事变至1934年底日本对上海第三国侨民的赔偿过程,重点论析了日美交涉的过程。作者认为,日本政府针对上海第三国侨民提出的索赔申请,一面极力推诿战争责任,一面又不得不正视这些随时有可能被“诉诸国际法庭”的索赔要求。在处理过程中,日本把美国侨民索赔以及与美国方面的交涉作为重点。在军部压力下,日本政府从公文中抹杀暗含日本人掠夺事实的条款,并修改公文,栽赃于中国民众。

六、抗战时期的媒体与文化

抗战时期,中国形成了国统区、敌后根据地及沦陷区三大区域。这三个区域文化迥异,对抗日救国的宣传动员也各不相同。

中共在国统区的媒体形象经历了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曹明臣(安徽师范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共媒介形象——以〈大公报〉资料为中心的探讨》)根据抗战爆发前后《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评论,指出中共媒体形象从原来的“匪”转变成“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背景下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政治地位的提高,及中共与媒体的互动积极。这一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中间阶层对中国共产党由不抱同情到认可赞赏的转变过程。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如何消除“中国必败论”对国人的影响,从战略战术上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是宣传工作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黄延敏(首都师范大学,《抗战时期郭化若对传统兵学文化的发掘与借

鉴——以《八路军军政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对郭化若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系列文章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日本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对内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消极抵抗,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郭化若撰写了《赤壁之役》、《齐燕即墨之战》、《淝水之战》等文章,总结古代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解析《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必胜信念。郭化若指出内部的统一是弱国战胜强国的重要原因,呼吁跟破坏统一战线者作坚决的斗争,宣言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必然最终取得胜利。郭化若的论述不仅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作战能力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有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作战能力。

沦陷区的文化人如何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为与会者所关注。张长虹(上海大学,《傅雷与“黄宾虹八秩纪念画展”——记1943年上海举办的一次美术展览》)从美术展览与策划的角度,探讨了傅雷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策划举办“黄宾虹八秩纪念画展”的经过,借此展示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的艺术活动和精神追求。傅雷通过发掘黄宾虹作品中的中西交融因素,将黄定位为沟通中西型画家,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型老画家黄宾虹成功地以沟通中西型画家的新面貌包装推出。黄宾虹虽未能亲临上海,但书画展无论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画展展示了一种勇于革新、创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起到了激励沦陷区人们爱国热情的作用。

陶飞亚(上海大学,《从普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抗战前的〈教务杂志〉看基督教与中日关系》)通过梳理《教务杂志》1931—1937年间关于中日局势和救亡图存

的言论,考察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基督教组织以及信众在危机中自我调整,支持和投身抗战的历史。作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基督教界与日本基督教界均曾致力于敦促中日双方和平化解危机,但效果甚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基督教界坚持中立立场,并联合日本基督教界谴责日本的武装侵略、声援抗日;“一·二八”事变后,身处战争中心并惨遭打击的事实,促使中国基督教界逐渐放弃中立,呼吁国民政府自强抗战,呼吁英美势力对日本加以约束,动员教众抗日。由于中日战争的现实影响,在中国一直宣扬普世主义和平福音的基督教受到严重挑战,不得不再检讨自己的立场,最终转向支持和投身抗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这一历史转变在《教务杂志》中得到了清晰地呈现。这种转变一方面体现了基督教组织及其信徒在全民族抗战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国基督教在危机中的自我调适和转变。转变背后也包含着借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之机发展传教事业的考虑。

本次研讨会问题意识突出,论述角度多元,涉及领域广泛,资料来源丰富,抗战时期社会生活史或将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会议学术气氛浓厚,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平等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有较多年轻学者包括为数不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显示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刘长林、章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责任编辑:徐秀丽)